

瑞典文、  
先后被译成  
朝鲜文和日文。  
中文首次  
与中译本见面。



# 七次 东方旅行记

【芬兰】G·J·兰司铁 著  
泰米尔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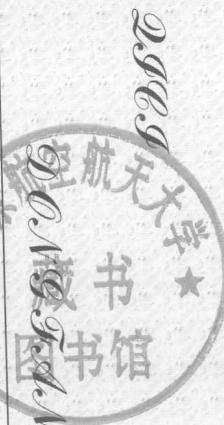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531  
02

014038930

尔

# 东方旅行记



【芬兰】C·J·兰司铁著

泰米尔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704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次东方旅行记/(芬兰)兰司铁著;泰米尔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04-11459-7

I. ①七… II. ①兰… ②泰… III. ①游记  
-作品集-芬兰-现代 IV. ①I53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9864 号

## 七次东方旅行记

---

著 者 (芬兰)D.J 兰司铁著 泰米尔译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封面设计 李 琳

出 版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1459-7/G · 2752

定 价 21.00 元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 前　　言

古斯塔夫·约翰·兰司铁(1873 – 1950)出生在芬兰南部沿海城市埃格纳斯(塔米萨里)的一个讲瑞典语的工人阶级家庭。对芬兰民族运动的热情使得他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了古典东方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1898 年,年仅 25 岁的他,被芬 - 乌戈尔学会派到当时还属于清朝疆域的喀尔喀蒙古地区。他在蒙古的任务是学习和研究蒙古书面语和口语,这项芬兰的语言学研究传统是由 M · A · 卡斯特伦(1813 – 1852)在此前 50 多年前开创的。

在(1898 – 1912)十五年的时间里,兰司铁总共做了七次向东的旅行。在这些旅行中,他搜集了大量蒙古语、突厥语和通古斯语言的资料。例如伏尔加地区卡尔梅克人、俄罗斯与阿富汗边境上的莫卧儿人、高加索地区的库梅克人和诺盖人的语言。他还学习了这些地区的古代书面语言,其中包括古突厥语和中世纪蒙古语。

在 1902 年出版其博士论文《喀尔喀蒙古语的动词变化》之后,兰司铁在蒙古语语言研究方面的权威性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兰司铁本着当时新形成的新语法学派的精神,成为了现代蒙古语研究的创始人。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项比较蒙古语和其他语族的长期研究。最终,他提出阿尔泰语系中应包含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通古斯语族。1917 年,兰司铁任命赫尔辛基大学的阿尔泰研究教授,直到 1941 年退休。

直到 1917 年,芬兰都是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但在十月革命之后芬兰脱离俄罗斯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与此相似地,在 1911 – 1912 年期间,辛亥革命之后,蒙古脱离清朝宣布独立。兰司铁在芬

兰和蒙古的独立运动中均有参与。1919年，他任命芬兰的第一位至远东的外交代表。虽然芬兰大使馆在东京，但是其他远东国家，包括泰国和中华民国也承认了兰司铁的身份。

兰司铁在日本生活至1929年。在此期间，虽然他已不用担任赫尔辛基的教授职责，却一直没有间断他的科研工作。他很快学会了日本语，又对朝鲜语发生了特别的兴趣。回到芬兰之后，他在1939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朝鲜语语法书，此后又出版了关于朝鲜语词源研究的书。兰司铁的主要结论是：朝鲜语（而不是日语）也属于阿尔泰语系。

今天，兰司铁被认为是其研究领域——蒙古学、朝鲜学和阿尔泰学的先驱者。如今阿尔泰学依然是芬兰重要的学术领域。它也早已变得国际化，许多国家，例如德国、俄国、匈牙利、土耳其、蒙古、韩国、日本和中国都在致力于阿尔泰学的研究。兰司铁对于俄罗斯（后加入美国籍）蒙古学家尼古拉·鲍培的影响甚大，他也曾提到兰司铁是他的“导师”。在某种程度上，今天所有阿尔泰学者都是兰司铁的徒弟，因为之后所有的蒙古语、突厥语和通古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兰司铁的学说完成的。

近年来，许多欧洲学者和俄罗斯学者的游记、回忆录和其他作品被译成了中文。这些译本成为了两个国家和两种学术传统极好的桥梁。兰司铁不仅是一位重要的学者，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录作者。最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他的旅行记将要在中国出版。

令我极其高兴的是，泰米尔小姐完成了这本书的汉译工作。她的父亲也是我的内蒙古同行和好友布赫朝鲁教授。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会为芬兰与中国内蒙古友谊的加深做出贡献。

楊虎嫩

赫尔辛基大学东亚语言文化教授

中国内蒙古大学名誉教授

## 译者序

兰司铁(G. J. Ramstedt, 1873—1950), 芬兰人, 曾任赫尔辛基大学教授, 芬兰科学院院士, 是享誉世界的东方学家、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理论奠基人。著有《卡尔梅克语辞典》、《喀尔喀蒙古语的动词变化》、《朝鲜语词源研究》、《朝鲜语语法》、《阿尔泰诸语言与日语的比较研究》、《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等学术著作。此外他还著有游记——《七次东方旅行记》。

兰司铁从 1898 开始向东旅行了七次, 所经之地包括南俄、中亚、西伯利亚和蒙古。回到芬兰许多年后, 应芬 - 乌戈尔学会学者们的强烈要求, 兰司铁将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 于 1944 年第一次在赫尔辛基出版。该书在芬兰再版了 4 次。《七次东方旅行记》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朝鲜文和日文。此汉译本是根据美国东方学家 J. R. 克鲁格(John. R. Krueger) 的英译本(1978 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 翻译的, 同时还参考利用了芬兰文原文(1951 年赫尔辛基第二版) 和荒牧和子日译本(1992 年东京中央公论社版)。

该游记不仅记录了喀尔喀蒙古地区的人文风俗, 还描写了卡

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切列米斯人、俄罗斯人、哥萨克人、库梅克人、诺盖人、莫卧儿人的后裔等诸多民族的历史风俗，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

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收到了赫尔辛基大学教授 Juha Janhunen 和 Harry Halen 先生提供的相关资料，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克鲁格先生于 1978 年将此书译成英文。感谢印第安纳大学蒙古学中心 (The Mongolia Society Indiana University) 给予本人克鲁格教授英译本的翻译权。感谢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全体恩师。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和支持。由于本人学识浅薄，翻译中难免出现错误，望读者指出批评。

泰米尔

2013 年 12 月

# 目 录

1 求学的日子 .....	1
2 切列米斯人的村庄和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 .....	4
3 1898 年的蒙古之行 .....	24
4 拜访卡尔梅克人的故乡 .....	84
5 追寻莫卧儿人的踪迹(1903 年) .....	117
6 新疆之旅(1905 年) .....	128
7 我的蒙古之行(1909 年) .....	165
8 我的蒙古之行(1912 年) .....	188

# 1 求学的日子

当我还是个年轻又好奇的学生时,就对语言和民族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上的是瑞典语学校,但在我居住的土尔库城外的劳尼 斯杜拉区里芬兰语是主要语言。这里也有操其他语言的人们,例如当时这里至少有两个俄罗斯家庭,也有人讲波兰语,还有一些懂 英语的水手。我在学校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大学入学考试 中也通过了希腊语和俄语的考试。我曾经想过将来要当牧师。但 我在大学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并且在学习 J. N. 路途 教授<sup>①</sup>的梵语课程时开始对比较语言学产生了兴趣。当时,我和两 位同学即后来在赫尔辛基和图尔库成为教授的海基·欧岩苏<sup>②</sup>和 同样在赫尔辛基成为教授的顿杰罗<sup>③</sup>一起研究语法问题并努力破 译那些难懂的文字。由于考试成绩最好,我们三个当中我第一个 得以报名参加奥托·唐纳教授<sup>④</sup>开设的梵语课程。

① J. N. 路途(1863 – 1937),芬兰语言学家。

② H. 欧岩苏(Heikki Ojansuu 1873 – 1923)芬兰语言学家,曾在赫尔辛基大学、图尔库大 学和赫尔辛基商学院从事语言学教学工作。著有芬兰最大部头的方言词典《杜尔 瓦方言词典》。

③ 顿杰罗(Eemil Aukusti Tunkelo 1870 – 1953),芬兰语言学家,曾任芬-乌戈尔学会主 席和芬兰科学院院士。

④ 奥托·唐纳(Otto Donner 1835 – 1909),芬兰语言学家和政治家,芬-乌戈尔学会的 奠基人之一。曾在赫尔辛基大学讲授梵语和比较印欧语言学。当过芬兰参议员,任 过教育部长。奥托·唐纳对兰司铁青年时期的影响很大。

芬 - 乌戈尔学会<sup>①</sup>的创始人之一奥托 · 唐纳教授,一直把一件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发现和培养有志于继承由马迪亚斯 · 亚历山大 · 卡斯特伦<sup>②</sup>和工作在圣彼得堡科学院的芬兰人安德列斯 · 约翰 · 斯约仁<sup>③</sup>的研究事业的年轻人。一些年来,奥托 · 唐纳寻找着合适的年轻人,并资助着他们。在担任芬 - 乌戈尔学会主席期间,他也用大量资金捐助着学会。

由于当时我得到了一份在土尔库芬兰语中学讲授瑞典语的薪酬不错的工作,就提前完成了我的大学毕业考试。但我在那里只干了两年就辞职了,因为唐纳教授答应聘用和资助我。

这时一位名叫乔治 · 胡特的德国学者来到芬兰,试图与唐纳教授合作组织一次去往亚洲的语言学田野调查。奥托 · 唐纳承诺如果一位年轻的芬兰学生愿意同行,他将支付旅行的一切费用。开始他们提议,一位由唐纳教授资助在柏林学习汉语的文学硕士与乔治 · 胡特同行。但由于那位叫做雨果 · 隆德的硕士拒绝以这位德国学者(犹太人)的助手身份(而不是伙伴)随行,唐纳便开始与我讨论亚洲旅行的事情。

雨果 · 隆德后来告诉我,有一次他在柏林与胡特博士讨论芬兰人和芬兰语时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胡特博士认为芬兰人的祖先是蒙古人即亚洲人,他们是从别处来到欧洲的。这也许是卡斯特伦观点的延伸,并不是十分有根据。关于芬兰人的祖先究竟是

① 芬一乌戈尔学会(Finno-Ugrian Society)是芬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学术团体之一,自1883年成立以来致力于研究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及讲这些语言的人民的民族志、历史与史前史的研究。出版《芬一乌戈尔学会杂志》等出版物,对相关学术工作提供助学金或研究资料。

② 马迪亚斯 · 亚历山大 · 卡斯特伦(Mathias Alexander Castrén 1813—1852),芬兰著名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

③ 安德列斯 · 约翰 · 斯约仁(Anders Johan Sjögren 1794—1855),芬兰人,著名探险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否是蒙古人或蒙古人种的问题一直是我学生时代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1897年春天,唐纳教授、胡特博士和我正在为去蒙古旅行作计划。唐纳教授承诺所有费用方面的事情都将由他打理。但是,当我发现胡特博士既不懂俄语,又不愿意骑马旅行(他的身材又矮又胖),而且在赫尔辛基时甚至要求我作为他的年轻助手去帮他拿行李和处理所有琐碎的事情时,我犹豫了。而当我得知唐纳教授打算让胡特博士掌管所有经费时,我婉言拒绝了与他同行。胡特博士一无所获地离开了赫尔辛基,唐纳教授的计划也被打断了。之后我提出,如果允许我独立完成,我将进行田野调查。最后,有唐纳教授每月给我提供助学金,我就又开始了在赫尔辛基的学习。这次我致力于芬-乌戈尔语言的学习。我的老师埃米利·内斯特·赛达拉教授非常认可我做出的努力。在1897-1898年的学年中,我学习了芬-乌戈尔语系语言,语音学和俄语。唐纳教授所感兴趣的事业变成了我人生的主要目标,由此我将成为一名远方语言的专家,一名突厥语和蒙古语专家。

我清楚地知道,芬兰人早期的历史问题或所谓乌拉尔阿尔泰的问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由于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学术水平还尚不能为此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想一个芬兰人,一个芬兰语专家可能会比一个德国人或一个瑞典人更适合完成这项任务。

但无论如何,我当时只是一个年轻的硕士,在诸多方面我的知识和能力还不能熟练地解决复杂的学术问题。因此,首先我需要以某种方式来检验自己的能力。于是赛达拉教授和芬-乌戈尔学会为我安排了一次考察沿伏尔加河流域的切列米斯人的旅行。过去很少有人对切列米斯人的语言进行过调查研究。这样,1898年我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调查,后来又做了一系列类似的旅行。

## 2 切列米斯人的村庄和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

赫尔辛基大学校长办公室给了我 1000 芬兰马克用于这次田野调查。在这之前,我刻苦学习了语音学和芬 - 乌戈尔语言学,尽全力把俄语口语练熟了。我对自己能为芬 - 乌戈尔研究做出贡献充满了信心。

在图尔库时,我结了婚。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刚满两个月大的女孩儿的父亲。于 1898 年 6 月 5 日,我带着我的家人从赫尔辛基火车站踏上火车。我们的护照是上一代的人很熟悉的那种用三种语言写成的细条纸,是由芬兰乌西玛省总署于 6 月 4 日签发的。我们的行李并不多,但我们带着一辆漂亮的婴儿车,一架好相机和充足的药物等等。到达圣彼得堡之后,我们当晚就踏上了去往莫斯科的火车,然后从莫斯科又转乘去往下诺夫哥罗德的火车。

记得在莫斯科,当我们看到漂亮的绿色房顶、众多的教堂和脏兮兮的敞篷马车车夫时觉得很新奇。但我们对于一种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又小又白的废弃物感到更惊奇。人们咀嚼后吐出来的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刚开始妻子和我都以为,这就像在图尔库,人们在街道撒上盐,以防止铺路石间隙里长出杂草。但很快我们又明白原来这些白色东西是葵花籽皮,是俄罗斯人走在街上吃葵花籽时吐出来的。

在下诺夫哥罗德我们踏上一艘蛮气派的萨摩亚特公司轮船。从甲板上能观赏到周围的环境,妻子和我第一次看到伏尔加河沿

岸广阔的风景、过往的船只和匆忙的人群。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乘坐明轮轮船在伏尔加河上旅行的感觉真是无以伦比。

船长发现我们是外国人，于是就走过来与我们说话。他说他来自里加。他用德语跟我们说，我们的目的地科兹莫杰米扬斯克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城市，那里只有4—5千个居民，也没有能供我们过夜的旅店。因此，船长用友好的语气劝我们在轮船码头的栈桥里过夜。在这里，我必须向我的读者解释，沿伏尔加河的轮船码头是由大型驳船做成的。驳船的甲板上堆放着货物，人们来回穿梭着；而甲板下，是贮藏间和巡夜人的住处等。这些驳船被牢牢地拴在了岸上，并且由一条宽宽的舷梯通往岸边。

尽管船长一再劝说，我们却不大情愿在码头过夜或在那里滞留。但我们到达科兹莫杰米扬斯克后船长还是安排我们住在了驳船甲板下的客房里。那里有他先前向我们吹嘘过的柔软的睡椅和舒适的椅子。但在轮船离驶后不久甲板上搬运麻袋和装载货物的声响便开始不绝于耳。突然，一艘进港的轮船撞到了我们的驳船，使得我们刚刚入睡的小女儿差点从沙发上滚落下来。我妻子开始对我们的住处感到非常不安，她认为船长骗了我们，尽管码头守卫一直尽可能地为我们提供着服务。

夜幕下，高高的河堤下面还走着一些俄式四轮敞篷马车。我走到其中一辆马车前询问这里是否有旅馆。车夫很确定地说，这里当然有那样的地方。在码头守卫惊愕的眼神中，我们将行李搬上了四轮马车，扬尘离去。

但是车夫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他把我说的“旅馆”理解成了“酒馆”。在去过几家闹哄哄的酒吧之后我终于成功地让他明白我们是想找一个能过夜的地方。“啊，诺麦拉，诺麦拉”车夫说，“你应该跟我说‘诺麦拉’”。我并没有弄懂他所说的“诺麦拉”，但我们的马车颠簸着穿过科兹莫杰米扬斯克黑暗、肮脏的街道后最终停

在一扇紧闭的大门前，车夫敲击着大门，喊道：“阿格拉菲娜，阿格拉菲娜，我给你带客人来了！”

一个蓬头乱发的老妇人打开大门，手忙脚乱地迎接了我们。她往车夫手里塞了一些钱，随即开始称赞自己的房子。我们穿过庭院来到一所破败不堪的房子跟前，从一扇山墙上的门进入到了仄仄的走廊。走廊的两边都有房间。“这间住一天 60 戈比。”“没有比这个大一些，好一些的房间吗？”“天啊，有的，比如这一间，要 80 戈比。”“那边那一间是不是更大一些？”第三间空屋子要一个卢布，尽管比其它屋子强不到哪里去，我们还是选择了那间。

我们带着所有行李在屋内等待有人来收拾床铺，因为除了一张可怜的床垫，光秃秃的床架上再无其他东西。我们等待着，老妇人却不见人影。原来她是进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我找到她后问她有没有茶水。“马上来！”几分钟后老妇人带着一把沸腾的俄式茶壶和空茶碗来到我们面前。我和妻子目睹着这一切，感到非常惊奇。可我们的客栈主人阿格拉菲娜显然对我们觉得更加匪夷所思，因为我们居然没有随身带着茶，糖，杯子和勺子。她对我们发了牢骚，因为我们想要睡在床单上，而从种种迹象来看她这里应该没有那种东西。

那一晚我们和衣而睡。次日早晨一个警察来把我们的护照拿去盖章。他走后没过多久又回来要求我们一同去警察局跟他们的局长谈话。

前面我提到过，我们的护照是 1898 年 6 月 4 号签发的。我们马不停蹄地来到此地。而在当时，按俄罗斯的历法要比我们的晚 12 天，所以我们到达时候的俄罗斯还在 5 月份。

警察局长告知我，据护照上的日期来看，我们的护照是无效的，说它很明显是伪造的。我向他解释在芬兰我们使用着不同的历法。警官说他当然知道外国在使用新历法的事情，但乌希玛省

政府是隶属于俄国的。我与他争论起来,他对于我的辩解感到很气恼,命令我出去。而没过多久,他又亲自大驾光临阿格拉菲娜家告知我们由于未持有效的护照,我们必须在 24 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否则他将命令警察用囚车遣送我们回芬兰。

事情糟透了。这次我真的是要哭了。警官看了一眼我的妻子和女儿,对我说:“你不用如此萎靡和沮丧。你一定带着钱吧?”我试图解释自己是在去这座城市邻近的切列米斯人居住地的旅途上,在这里是短暂逗留而已,但这无济于事。“那地方归我管,因此你的整个旅行许可还得靠我。”这是他的回答。

局长走了后,我揣着自己无效的护照出去买了杯子、勺子、茶和糖,在痛苦之余又去拜访了一位医生。科瓦列夫斯基医生为我解答了局长特殊的暗示:“你有钱”,“你想要旅行许可得靠我”,“这件事情有办法解决”。我眼前的迷雾渐渐散去。总之,我决定绝不贿赂任何人,也绝不给那位警察局长一文钱,因为我是完全有合法权利呆在此地的。

阿格拉菲娜为我们准备好俄式茶壶,还承诺只要我们有东西放在锅里,她就给我们做饭。然后我去警察局说明自己打算去拿来另一个护照,只希望他们能让我年轻的妻子和孩子在阿格拉菲娜那里呆几天。这个要求被痛快地接受了。

傍晚 6 点钟左右,萨摩亚特公司的码头上停着两艘船。一艘将在伏尔加河上逆流而上,另一艘将载着旅客顺流而下。警察局长叫我坐前面那艘船,但事情并没有如他设想,我没有打算去圣彼得堡,而是想要顺伏尔加河而下,去往省府所在地喀山。在最后一刻,我登上了另一艘船上。

凌晨 4 点钟,我到达了喀山,这个安静的、陌生的、依然在睡梦中的城市。我走到一座公园,坐在一条长凳上打了一会盹。这时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走出他们的家。我在公园里一直坐到早上 8

点钟。一位大学生碰巧坐到我的长凳上,于是我与他聊起天来。这位名叫雅儒谢夫斯基的大学生是个波兰血统的人。他知道政府办公厅座落在何处以及什么时间办公。我对他叙述了关于自己护照的故事,他愿意为我做向导去办公署。

当政府办公署早上10点钟开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到达那里。我告诉秘书自己来这里的目地,事情很快就在政府文件上变得非常明晰。芬兰总督要求喀山知事给兰司铁出具同意他来此地考察的公函。而前两天公函已经发往赫尔辛基,我们却在文件到达之前就从赫尔辛基出发了。

当我拿到省办公署针对全省所有官员和机构的文件时,感觉到所有困难将会迎刃而解。不过经历这次事件,我变得有点像“多疑的多马”。我说,万一科兹莫杰米扬斯克的警察局长不承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那该怎么办?经过几番交涉,我又得到了一封写给局长个人的盖了章的信。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和雅儒谢夫斯基出去美美地吃了一顿。我跟那热心的学生道别后去等待开往科兹莫杰米扬斯克的第一班轮船。

我回来后自信地要求局长陪同我一起回到阿格拉菲娜的家庭旅店。看到妻儿都安好,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我给局长看了省办公署的文件。他看到文件便表现出愿意服务的样子。“但那护照上的日期又是怎么回事?”他吞吞吐吐地说。那护照绝对不是伪造的,我坚持道,同时掏出了省署长官写的那一封信。局长读着写给他个人的信,面色红一阵白一阵。那封信确实写的相当严厉。

现在警察局长和两天前他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判若两人,当然他同意我在此地自由旅行。不仅如此,由于切列米斯人的村庄里不会有像样的商店能买到好茶,巧克力或别的好东西,他建议我妻子列一个购物清单。随即,局长带领我们前往城里最大的杂货店,

又亲自帮我们砍价。“要是没有我”他肯定地说“你们会挨宰的”。这商店的人几乎跟两天前因护照的事而痛苦不堪的我一样惨了。当我们备齐所有必需品后局长为我们安排了免费的马车，声称我们可以用它去越拉索瓦或其他任何切列米斯人居住区域内想去的地方。但我谢绝了他，我不希望接受警察局长的恩惠，我要自己办自己的事。

我在商店注意到一些切列米斯人。他们总是穿着白色麻布长衫，因此很容易被辨认出来。我雇用其中一个人，要他把我们带到他所居住的村庄。他们村庄离这里大概有 25 公里远。他叫邵仁提，显然对我们的意图感到困惑不解，但他还是答应了。他从阿格拉菲娜家里把我们所有的行李搬上了自己的马车上，我们从那里出发前往他的家乡，尽管他认为有教堂的村庄可能更适合我们。马车有时在平坦的路上，有时候避开泥泞的道路走在嫩绿的草原上，我们就这样在晚霞的余晖中到达了图石纳乐村。

村庄很小，只有三十来户人家。邵仁提首先带我们去了他自己的家。他的房子很小，看起来很穷。村庄的正中间，有一座属于名叫库兹敏的家庭的大房子。我们租用了库兹敏家房子的一楼。他们在私塾学习过的 17 岁的大儿子狄牟塞也过来为我们做帮手。在图石纳乐这个小村庄，生活是如此美好，我和妻子都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村子南边有条小河，河道深深的。我和狄牟塞在河道里修了一道小坝用以蓄水，村里的小男孩们就去那里戏水，玩的不亦乐乎。在镇子西南边的陡峭山坡上，长着落叶林，枫树和菩提树，我们在夏日的傍晚闲坐在树下，好不惬意。穿过田野向南望去，可以看到一个有教堂的村庄—维罗瓦提乌拉格村，那里住着我们先前偶遇的警官。

我在前面提过，作为考察费我得到了 1000 芬兰马克的资助。